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当代政治哲学

[法]高宣扬 著



P H I L O S O P H Y

上卷

 人民出版社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当代政治哲学

[法]高宣扬 著

上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前 言

哲学,作为人类的一种“超越”活动,实质上就是以不断更新的“惊奇”态度,一再地向人自身以及人类所面对的世界提出质疑,“发出提问”,由此深刻地体现出:人,作为“一种政治动物”,其自身始终不满足于既得的现成答案,试图不间断地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好奇”,使被发问的对象和问题,在延绵的“被搁置”和“被怀疑”中,遭受人的哲学思维的挑战性探讨,成为引诱哲学家永远进行反思的精神创作源泉,并在人生历程中,也成为人类自身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提升的生命动力。

哲学性的惊奇,实际上也是人对自身所处的命运的关切态度。政治,作为人生在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哲学惊奇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诚然,哲学家之关心政治,采取了很特殊的方式,使哲学家对政治的“惊奇”,既不同于专业政治家的态度,也不同于一般人所表达的方式。

哲学家是以探讨政治哲学的理论抽象途径,一方面表现他们对政治事业和人类命运的关切和负责精神,另一方面又当成训练个人“实践智慧”(Phronésis; Practical Wisdom)的重要手段,使自身通过对政治的一再惊奇,将自己培养成掌握社会生活基本经验的成熟的人。

正因为这样,哲学家对政治哲学的探讨本身,实际上也就是对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政治“保持合理间距”的一种生活艺术(l'art de vivre);它是一辈子学不完、做不完的“实践智慧”,同时也是丰富哲学活动的内容并不断对哲学进行革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

从事哲学研究的个人命运,使我时时关切政治哲学问题。如同笔者对哲学其他问题的关切那样,对政治哲学的论题和探索,始终构成个人从事哲学研究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的精神动力。

这本《当代政治哲学》是应新形势的需要而撰写出来的。这本《当代政治哲学》有四大特点:第一,针对世界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新进程,开辟

2 当代政治哲学

新的政治视野,集中讨论新的政治论题,引入最新的政治概念;第二,以新的观点和研究成果,重新探讨政治哲学史,根据实际的全球政治的新动向,参照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的相关理论及其基本概念,简略地概述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当代所可能采取的多元化理论形态;第三,集中评述最新的政治哲学争论状况及其理论焦点,探索未来新政治哲学的可能发展方向;第四,以多学科或跨学科的景观,开发和探索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及其论述体系,以便彻底超越传统论述的框架,尽可能清除各种早已过时的观念和方法,使 21 世纪的政治哲学能够在广阔和开放的理论层面上,实现全面的复兴和重建。

然而,任何创新都无法从虚无的文化沙漠出发。正如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所说,必须承认作为“先见”、“前见”或“前判断”的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功效历史意识”(Wirkungsgeschichtliches Bewußtsein; Historically-effected Consciousness)及其为我们开辟新“视野”(Horizont; Horizon)的可能性,并认真地从“作为一种人类历史理性的传统”出发,在异常复杂的“视野交错关系”(Horizontverschmelzung; Fusion of Horizons)中,寻求建构开展文化和思想创造活动的坚实基础。^①

因此,在结构上,本书一方面优先讨论当代的全球政治问题以及新的政治论述,另一方面又照顾到传统的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及其现实的理论命运,以便在对照不同政治理论的基础上,既使读者掌握当代政治的动态,又使他们懂得理论上的来龙去脉,真正理解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逐渐训练青年学生在哲学思维中形成“创新与传统相交错”的理论视野。

政治哲学,在最近几年的中国学术界,有被“炒作”而“走红”的嫌疑。因此,这本书的出版,似乎赶上了这个“不合时宜的”“时髦”。但本书作者并没有为此担心,因为作者确信:只要现实的社会生活本身还存在政治活动的基础,只要政治哲学本身能够随时灵活地适应全球社会的发展而更新,只要公民们还保持着清醒自律的政治意识,政治哲学就有可能也有必要,在社会中获得发展和更新,并因此有可能找到它的适当读者。

值得指出的是,为了不迎合当前流行的各种观点,本书在政治哲学争论

^① See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5th edn, 1975; in *Gesammelte Werke*, Bd. 1. J. C. B. Mohr. Tübingen, 1985.

和前沿论题方面所强调的,恰恰是当前国内流行的政治哲学话语所忽略,甚至是与其相对立的部分。所以,本书有意提供不同于现行国内政治哲学讲坛的“另类”政治哲学观察视野。

最重要的,也是本书作者在这里要突出强调的:本书并不同意各种推崇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政治哲学观点的“时髦”论述,因为他的政治哲学实际上并不是当前西方政治哲学界的“最重要的理论”,甚至也不是美国政治哲学中的首要典范。人们实际上误解了他的政治哲学,甚至有意制造了对他的神话。

本书作者经常遇到来自美国的政治哲学家,他们往往感到奇怪和费解:“在美国并没有被多数人理解的列奥·斯特劳斯,为什么在中国得到了远比美国学术界高得多的礼遇和传颂?”更难以理解的是,当中国的列奥·斯特劳斯追随者声称他们是“受美国政治哲学气氛的影响”的时候,美国政治哲学家反而宁愿以“沉默”的智慧,表示他们对此采取的更为谨慎的认真态度。至于在欧洲,列奥·斯特劳斯倒真的几乎成为了“死狗”,被多数理论家所冷落,因为他的政治哲学既不是当代欧洲的“主流”派别,甚至也不是自由主义的最重要的学派,只不过是整个自由主义大流派中的一个热衷于传统“精英政治”的保守主义小分支。就连他的原籍德国的同胞,也很少以中国政治哲学界所表现的如此狂热态度来讨论他的政治哲学理论。这一切,值得引起中国政治哲学界的注意。

本书的基础,还涉及作者此前更久远的研究生涯:它是作者近30年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政治哲学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以及在欧美各国的实地考察而收集的原始资料的综合性作品,同时,还适当借用了作者在国内讲授政治哲学课程的讲稿和撰写的各种专题论文的内容,其中还包含作者在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巴黎第十大学政治系、台湾大学、东吴大学及台湾政治大学所做的政治哲学相关研究。

基本上,本书试图向21世纪的大学生、研究生及一般具有政治意识的公民,提供一个比较适时、完整而简明的当代政治哲学理论及其主要概念,使他们清楚地了解到当代政治活动以及政治哲学的特点,同时也获得关于当代政治哲学的最一般和最基础的知识,为进一步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思考奠定基础。

本书原来的安排,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典范论述

4 当代政治哲学

及其转换;第二部分是当代重要的政治理论,讲述政治和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和政治哲学的一般定义、研究范围及其历史演变),并按国别也按政治哲学家个人以及按不同学派,分别进行论述并加以比较。

关于政治哲学的参考资料,本书主要引用外语原文(英文、法文和德文)的第一资料,特别是最新的资料,使读者从一开始研究政治哲学,便习惯于查阅和分析原文发表的原始资料以及最新的文本。

高 宣 扬

初稿于2007年暑假

法国尼斯东郊

Saint Laurent du Var 别墅;

定稿于2009年寒假

法国南部 Cagnes sur Mer 海边别墅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导 论 当代政治哲学的典范论述 | 1 |
| 第一节 21 世纪“全球政治”的出现 | 1 |
| 第二节 政治的技术化 | 3 |
| 第三节 全球政治的市场化 | 15 |
| 第四节 政治哲学论述典范的转化 | 15 |
| 第一章 新政治哲学论述的特点 | 42 |
| 第一节 当代政治哲学论述的转变 | 42 |
| 第二节 政治哲学的论述性质 | 43 |
| 第三节 政治哲学论述中的“知识的意愿” | 44 |
| 第四节 对政治哲学论述的“真理性”的质疑 | 46 |
| 第五节 论述及其实践的政治性 | 48 |
| 第六节 后现代政治论述的特征 | 50 |
| 第七节 现象学的诠释模式 | 63 |
| 第八节 女性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论述 | 86 |
| 第九节 当代政治哲学论述转变的基本条件 | 127 |
| 第二章 美英政治哲学传统的转变 | 128 |
| 第一节 研究前沿的一般状况 | 128 |
| 第二节 罗尔斯:以正义的名义批判功利主义 | 132 |
| 第三节 诺齐克的“放任型自由市场模式” | 138 |
| 第四节 新保守主义的复兴:列奥·斯特劳斯 | 141 |
| 第五节 诉诸新公民社会的社群主义 | 142 |
| 第六节 多元化的新理论场域 | 144 |

| | | |
|------------|----------------------------|------------|
| 第七节 | 英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转型 | 152 |
| 第八节 | 季登斯的“现代性政治哲学” | 186 |
| 第三章 | 德国政治哲学传统的新变化 | 235 |
| 第一节 | 德国当代政治哲学的一般特征 | 235 |
| 第二节 | 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 | 245 |
| 第三节 | 斯洛德岱克的“生命政治哲学” | 414 |
| 第四节 | 鲁曼的社会系统与风险政治哲学 | 417 |
| 第五节 | 阿尔诺德·格伦 | 463 |
| 第六节 | 赫弗的正义论 | 481 |
| 第七节 |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 | 483 |
| 第八节 | 阿克瑟尔·霍内兹的社会哲学 | 485 |
| 第九节 | 赫尔穆特·柯因的法哲学 | 490 |
| 第十节 | 依凌·菲彻尔的马克思研究 | 491 |
| 第十一节 | 敏科勒的政治思想史研究 | 491 |
| 第十二节 | 贝克:风险社会的政治哲学 | 493 |
| 第四章 | 法国政治哲学论述典范的变革 | 497 |
| 第一节 | 当代法国政治哲学的一般状况 | 497 |
| 第二节 | 在生存世界中探索人的自由 | 517 |
| 第三节 | 福柯政治哲学的诞生及其影响 | 562 |
| 第四节 | 德里达政治哲学的典范论述 | 591 |
| 第五节 | 利奥塔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特点 | 631 |
| 第六节 | 利科的现象学政治哲学的特征 | 647 |
| 第七节 | 列维纳斯 | 667 |
| 第八节 | 让·吕克·南希政治哲学的艺术模式 | 680 |
| 第九节 | 吕克·费利和阿兰·雷诺的新自由主义 | 684 |
| 第十节 | 贾克·朗西耶的“图像政治论” | 687 |
| 第十一节 | 布迪厄的象征性政治哲学 | 688 |
| 第十二节 | 雷蒙·阿隆 | 797 |
| 第十三节 | 萨特 | 809 |
| 第十四节 | 阿尔杜塞 | 838 |
| 第十五节 | 德勒兹 | 847 |

| | |
|-------------------------------|-------------|
| 第十六节 贾克·朗西耶 | 849 |
| 第五章 拉丁美洲的政治哲学 | 852 |
| 第一节 当代拉美“第一代”政治哲学家 | 852 |
| 第二节 法兰克及其“依赖理论” | 855 |
| 第六章 政治的基本问题及其时代性 | 872 |
| 第一节 政治的基本定义 | 872 |
| 第二节 现代政治的特征 | 906 |
| 第三节 政治组织及其制度的性质 | 921 |
| 第四节 政治的改革 | 935 |
| 第七章 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 944 |
| 第一节 对于政治的性质的哲学探讨 | 944 |
| 第二节 政治哲学的基本模式 | 992 |
| | |
| 参考文献 | 1009 |

导论 当代政治哲学的典范论述

第一节 21 世纪“全球政治”的出现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人类社会,不论在性质上,还是在基本结构及其运作逻辑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重要方面,也在全球社会的这场激烈变动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是,目前的政治活动,不管是在哪个制度下,也不管是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都已经越过各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全球的性质,以至我们可以说,21 世纪的政治,已经成为了“全球社会”的政治,而任何国家的政治也因此都含有“全球政治”的性质。

但是,对于“全球政治”这个概念,还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正确地理解其真实内容。

首先,“全球政治”并不意味着各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以及各地区的特殊政治的彻底消失,也不是像日本的那位自称发现了“新”政治形势的新自由主义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那样,似乎当代世界已经“达到历史的终结”,世界政治将毫无疑问地被纳入自由主义的“新秩序”。^①

相反,全球化的结果,反而给予被冲击的地区性经济、文化和政治以新的机会并从此被“激活”起来。这是一种伴随全球化而发生的全球性“政治共振”现象,也是全球化本身的悖论性所产生的“副产品”。从其性质和实际力量来看,这个“副产品”并非“次政治”,而是有可能发展成为决定世界历史未来发展方向的强大动力。

^① See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92; *La fin de l'histoire et le dernier homme*. Traduit par D. A. Canal, Paris, Flammarion. 1992.

正如 16 世纪前后国际政治向近现代政治过渡时期所发生的根本转变的状况一样,握有或试图垄断世界霸权的西方国家,总是在国际政治的转变方向、内容及其模式上,基本上扮演着操纵者的角色。

因此,在 16 世纪前后,出于维护西方霸权利益的需要,当时的西方国家一方面,把它们自身的民族主权列于首要地位,以便使西方各国的国家主权提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另一方面,为了使他们的殖民活动合法化,对非西方国家则打着传播“西方文明”的旗号,无所顾忌地践踏殖民国家的主权,甚至肆无忌惮地残杀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人民,丝毫不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主权”放在眼里;同样也谈不上“尊重殖民地国家的人权”的问题。

在 20 世纪进入全球化的时刻,西方国家如同它们在 16 世纪所做的那样,也照样以“双重标准”推行他们的全球政治战略。

就是这样,西方国家的政治哲学理论的代言人之一福山,一方面声称“民族国家的概念过时了”,为西方国家推行符合他们利益的全球化策略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又再次提出“人权”和“民主”的口号,以便使它们能够“合法地”打着“维护人权”和“传播民主”的旗号,肆无忌惮地践踏非西方国家的主权,并以他们制定的“标准”,不惜通过发动战争的途径,任意地干涉别国主权。就好像在海湾战争中那样,美国等少数民主国家,为了向“流氓国家”输出民主制,一而再地发动战争,强行改变别国的政治制度。

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全球化”和“传播民主”成为西方国家干预他国政治的“理由”,而打击“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维护世界新秩序,则成为他们派兵入侵他国领土的口号。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全球化无非就是将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向全球推销,使全球政治经济及文化实现西方模式的一体化。正如法国政治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所指出的,为达此目的,福山等人一方面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强调民族主权的口号已经过时,世界各国必须接受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另一方面又强调“人权高于主权”,“民主制具有普遍意义”,强制性地要求非民主制国家接受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①

同时,全球化的发展也成为西方强权国家转嫁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

^① See Derrida, *Spectres de Marx*. Paris. 1993.

的一个时机,使西方政治制度所遭遇的各种危机和难题,通过“全球化”的途径,肆无忌惮地强加在其他国家头上。2008年年底起源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最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借助于全球化的过程,正在迅速地席卷全球,使美国和各主要西方国家有可能把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灾难“平摊”给其他国家。

全球化中所带来的上述发生在各个地区的“共振”现象,已经引起许多政治学家、政治哲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的注意。

英国的原籍波兰的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 1925—)把全球化中产生的地区性共振称为“流动的现性”(Liquid Modernity)^①;法国的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则称之为“后现代世界的部落化”(la tribalisation du monde postmoderne)^②。与此同时,美国政治哲学家兼政治社会学家华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所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③(World System Theory)以及由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 2005)、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等人所提出的“依赖理论”^④(Dependent Theory),则更集中地针对全球化的发展而阐述了当代政治的特征,从而成为当代政治哲学论述转换的又一个典范。

所以,谈论全球化时期的政治哲学,不能单纯地只把眼光集中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哲学家,更不应该片面夸大类似列奥·斯特劳斯那样早已过时、充其量也只是为少数自称知识分子“精英”所崇奉的西方政治哲学家。

第二节 政治的技术化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各个角落,也使 21 世

① See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② See Maffesoli, “La transfiguration du politique”. *La tribalisation du monde postmoderne*. Paris. 2002.

③ See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Vol.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1730–1840*. New York. 1989;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④ See Frank, *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1978.

纪的人类社会,彻底变为“科技化的社会”:一切社会现象,包括政治生活,都被彻底地“技术化”,因而受到科学技术力量的制约。现代的技术,简直已经成为最强的权势,在各个领域中“称霸”,以至人们可以说,当代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当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一般社会的科学技术。决定当代社会科学技术的性质的基本因素,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当代社会科学技术是一支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技术人员队伍,他们不仅掌握技术统治权,而且也控制着社会的各个领域的领导权,因此,这批新型的科学技术队伍是有组织的政治领导力量;第二,当代社会科学技术是高度发达并具有强大力量的应用知识系统,对社会生活产生实际的效力和具体的影响;第三,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包含一系列具有强大改造威力和实践功能的工具、仪器设备、经营管理技巧和各种手段体系,其中尤其包括传播媒体系统及其附属因素,是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宣传和控制工具系统;第四,当代社会科学技术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当代社会结构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因而也是同当代社会中其他诸如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相结合的社会关系网络;第五,当代社会科学技术还包含着被改造因而附属于它本身的自然条件和自然力量,它们是实际地发生作用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人自身及其生活条件的自我生产和自我控制的手段”,使它不但可以改善也可以同时破坏人自身及其生活条件。这样一来,如何对待当代科学技术,已经直接成为人自身的未来的命运的关键。

综合以上六个方面的因素所组成的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已经不是传统社会所说的那种应用性的科学知识,它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传统意义的知识范围,而同整个社会的整体性变化力量结合在一起。

海德格尔从现象学的角度,针对当代技术的新特征,对“技术”进行崭新的说明。他说:“完成了的形而上学的时代就要开始了。求意志的意志迫使自己作为其显现的基本形式去计算和设置一切,而这只是为了达到对它自身的保障,一种可以无条件地继续的保障。求意志的意志处于完成了的形而上学的世界之无历史性中。求意志的意志进而就在显现的基本形式中设置和计算自己。而这种显现的基本形式可以简明地叫做‘技术’。在这里,‘技术’这个名称包括一切存在者区域,它们总是预备着存在者整体:

被对象化的自然、被推行的文化、被制作的政治和被跨界建造起来的观念。也就是说,‘技术’在这里并不是指机械制造和装备的孤立区域。机械制作和装备当然具有一种有待进一步规定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建基于作为所谓的元素(而且首先是对象性的东西)的质料的优先地位中。在这里,‘技术’这个名称是在十分本质性的意义上被理解的,以至于从其含义来讲,它就等于‘完成了的形而上学’这样一个说法。它包含着对‘技艺’的回忆,而所谓‘技艺’乃是一般形而上学本质展开的一个基本条件。这个名称同时也使下面这件事情成为可能,即形而上学之完成过程及其统治地位的全球性特性,是无须联系诸民族和各大洲在历史学上可证明的种种变化就能得到思考的。”^①

显然,海德格尔是把“技术”同西方形而上学体系及其所决定的基本思维模式的转换条件联系在一起考察的。这样一来,技术连同政治,就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西方各国的形而上学模式的传播及扩展而在全世界蔓延开来,并按照西方人的“求意志的意志”的胜利而统治全球。

所以,就当代科学技术队伍而言,不仅其组成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技术人员以最先进、最科学和最有效率的组织和制度结合在一起。在以往任何社会里,科学技术人员不仅占社会人口的极少数,而且零散地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使他们未能形成一个制度化和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和社会阶层。而且,技术人员作为科学和知识的应用人员,往往从属于科学知识界,在社会上占据劣势和被支配的地位。到了现代社会,科学和知识同技术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同商业和政治领域的统治力量相结合的技术力量,改变了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使他们从科学界和知识界的被从属地位变为统治的优先地位。同时,各种制度化的社会规范和法则,又进一步使他们的优先地位得到正当化和法制化。

传统的西方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原本就已经把自然科学看做是最一般的“科学”模式,并以此作为社会科学完成“科学化”之目标。20世纪60年代后,自然科学对于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及其“标准化”更是咄咄逼人。科学技术的胜利,还使自然科学对于社会的整个结构和运

^① Heidegger,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Verlag Günther Neske. 2000[1954]. 参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0页。

作进行更强有力的干涉和介入。其结果,使得研究社会的社会科学和研究政治的政治学及政治哲学,也越来越感受到科学技术对社会科学理论架构及其方法论所起的强烈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在这些领域中起着控制的作用和角色,其严重程度甚至使人们不得不把这个新的社会称为“科技至上主义”的时代或者“科技专制主义”(Technocracy)的时代。

由德国当代著名社会哲学家纪墨里(Walter Ch. Zimmerli)在20世纪80年代末编辑出版的《科学技术的时代或者后现代?》(*Technologisches Zeitalter oder Postmoderne?* 1988),集中地讨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 and 性质,尤其是深入研究了科学技术的决定性影响所带来的社会历史性变化的性质。这本书分别探讨了“艺术与技术”、“周围世界(环境)和技术学”、“科学、人和技术”及“科学主义、技术和合理性的危机”等重大问题。^①

由纪墨里所编的这本书,提出了当代社会科学技术的性质及其同整个社会、人和生活世界的关系的重大问题。首先,在探讨“艺术和技术”的关系时,思想家们第一次明确地把科学技术的问题同人的思想自由和思维模式关联起来。纪墨里认为,当代社会的性质既是后现代的又是科学技术的。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的”和“后现代的”,构成当代社会的一体两面的性质。重要的问题在于:当代社会所体现的根本性质,用“后现代的”标记来表示的时候,正是为了凸显一种特殊的高度自由的思想模式和生活方式;而当用“科学技术的”标记来表示的时候,正是为了凸显当代社会具有魔术式的力量的变化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性质集中地体现了当代社会高度不确定的变化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已经不是以往哲学家所追求的纯粹思想领域的发展自由,而是同当代科学技术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创造力量紧密结合的实践能力。因此,当思想家们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来标示当代社会的后现代性质的时候,正是强调了当代科学技术所包含的强大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创造力量。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当代科学技术力量中包含着后现代的人从事

^① See Walter Ch. Zimmerli, *Technologisches Zeitalter oder Postmoderne?* 1988.

思想创造的那种特殊心态。这种特殊心态集中地表现在人的**思维模式的图像化、影视化和艺术化**。当代社会人的思维模式的图像化、影视化和艺术化,意味着思维模式的多元化的可能性的进一步扩大。但是,思维模式的图像化、影视化和艺术化又如何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当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特征,就在于不像传统科学那样单纯严格受限于理性范围,单纯地把科学活动当成人的主体化对于客观自然的改造过程。因此,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科学技术本身超出传统科学的范围,也超出传统科学方法论的范围。如果说传统科学只追求发现实证的经验性客观规律的话,那么当代科学技术在实质上就体现了人对于自由的追求的可能性。由于这种对于自由追求的可能性包含着许多未知和不确定的因素,当代科学技术本身也已经把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和可能性当成其本身的本质构成部分。换句话说,传统科学只满足于获得确定性的答案,当代科学技术却宁愿以本身的不确定性作为其不断发展的原动力。

当代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的特质,正是当代科学技术一日千里不断发展的基础,也是当代科学技术同**图像、影视和艺术**相互接近,以至相互渗透的重要标志。当代科学技术的这种特质也严重地影响了当代人的思维模式。当代思维模式的不确定性,正是体现了当代思维模式的艺术化及其追求自由的本质。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所取得的控制论、信息科学和系统科学等各种最新研究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社会、自然和人自己的认知,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方法**。

其实,并不是当代科学技术单向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方法,而是整个社会整体性的变化本身首先影响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同时又使当代科学技术反过来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人的思维模式的转变。

以控制论的发展及其对于社会和人思想的影响为例。应该说,正是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大大加强了对于自然界的开发程度和进军能力,才使得科学家有可能集中研究控制论等当代科学技术问题。从1909年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发现质能等效性原理($E=mc^2$),1942年著名物理学家费米(Enrico Fermi, 1901—1954)在芝加哥大学建成第一个原子反应堆,1945年第一次实现裂变原子弹的爆炸,到

1952年实现第一次聚变氢弹的爆炸,都是同整个社会生产力、人力物质资源、科学管理的最新发展以及发明使用科学仪器自动化的新技能密切相关。

整个现代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及其复杂化,不断地提升对于整个社会和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当代科学技术中占很大成分的自动控制能力,实际上已经不是像传统自动机器那样仅仅作为人手的延长,而是作为人脑的扩展。这就表明,当代控制论已经使人类体力劳动的自动化进一步发展成为人类智能的自动化。

控制论的产生,表明当代科学技术不再是单纯地以自然作为固定对象、并以探索自然规律作为主要任务。控制论所研究的“控制”,实际上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作用和反作用的综合力量。它所要处理的问题,已经不是单一的因和单一的果的单向关系,而是错综复杂的、多面向的、各种可能的因果关系网。因此,控制论所探讨的,已经不是固定的或现成的物理世界,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这是一种可能性的空间和时间结构。控制论所探讨的各种控制活动,实际上是以表面使用的科学仪器和设备体现着人改造其生活环境的各种可能的意愿和能力。由于人可能的意愿和能力的复杂性及其自由本质,使人的控制活动充满着各种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控制论的发展影响了人们对于社会结构和行为的观点。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季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强调现代性的制度面向包含了监控(信息控制与社会监督)、资本主义、军事权力和工业主义(自然的变革:人造环境的发展)四个面向。上述监控机制表明了现代社会具有反思的功能。所谓反思,就是监控自身的实际过程,借此调整自身的行动。季登斯甚至把这种反思性称之为类似自动反馈的机制,并把这种功能看做是现代社会的—个基本特征。^①

由于当代科学技术内在地隐含着创造者和运作者的思想智慧和反思能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当代科学技术又变成了一种能够自我维持和自我再生产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法国希腊裔著名政治哲学家卡斯多力亚迪司(Cornelius Castoriadis, 1922—)指出:当代科学技术的神话,正是在于它本

^①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1991: 59-60.